

元明之际克新的诗文书写与自我表达

王钰潇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日

摘要

克新是元末明初活跃于东南文坛与禅林的一位诗僧, 早年掌书记于大龙翔集庆寺, 入明后奉诏出使西域, 然此后行踪无考, 卒年不明。克新自号“江左外史”, 在易代的政治动荡中, 其诗作表面营造了方外超脱之象, 实则通过典故意象等寄寓对故元的追怀与对新朝的疏离, 并流露出对世道凋敝与战乱现实的深切忧愤。克新在此时所作的诗文, 折射出他在易代之际仕隐两难的处境与遗民心态。

关键词

克新, 元末明初, 《雪庐稿》, 《元释集》

Poetic Writing and Self-Expression of Ke Xin during the Yuan-Ming Transition

Yuxiao Wang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July 28, 2026; accepted: August 2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 2026

Abstract

Ke Xin (克新) was a poet-monk active in the literary and Buddhist circles of sou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periods. In his early years, he served as a secretary at the Dalongxiang Jiqing Temple in Nanjing.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Ming dynasty, he was commissioned to travel westward, but his subsequent movements remain unknown, and his date of death is uncertain. Ke Xin styled himself “Jiangzuo Wai Shi”, and amid the political upheaval of dynastic change, his poetry outwardly portrayed an image of transcendent detachment from worldly affairs. Yet beneath this surface, through allusions and symbolic imagery, he expressed deep nostalgia for the fallen Yuan dynasty and emotional distance from the new regime, while also revealing profound sorrow and indignation over the decay of society and the chaos of war. The poems and writings Ke

Xin composed during this period reflect his inner conflict between official service and seclusion, as well as the mindset of a loyal remnant of the old dynasty.

Keywords

Ke Xin, Yuan-Ming Transition, *Xuelu Gao*, *Yuan Shi J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克新是元末明初的重要僧人之一，历经元、明两代，元末掌书记于金陵大龙翔集庆寺，明初奉太祖朱元璋的诏命出使西域，招谕吐蕃并收集情报，是明初最早奉命进入藏区的汉僧之一，在明初明廷治藏策略的实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克新也是一名诗僧，与杨维桢、顾瑛等文坛领袖交游唱和，写有大量诗歌，著有《雪庐南询稿》，编纂有《金玉编》，另有多篇序、记、跋等散文。克新的诗文作品至今没有完整的全集传世，目前存世的版本主要分为现代影印丛刊本、日本藏和刻本和存世清抄本三类，另有诗作散见于《明僧弘秀集》《大雅集》《樵李诗系》等。

目前学界对克新及其诗文的研究较少，对克新所处时代的诗僧群体研究则已有一定的学术积累。邓锐龄先生在《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一文中考述了克新五十岁出使西域前的生平，然而此后事迹及卒年，因史料缺失，皆已无考，是本文最重要的基础文献。代刚的《〈明僧弘秀集〉研究》[1]与李玉栓的《明代僧诗的佛教文化考察》[2]分别从文献与文化两个维度考察了明代僧诗的生成语境与佛教内涵，其中提及克新为禅宗临济宗的禅僧。李舜臣在《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3]中指出元代诗僧高度集中于江浙地区，且绝大多数属禅宗临济宗，这些诗僧的创作深受地域文化与宗派的影响，临济宗不同世系与政权的远近直接影响诗僧的创作取向，寥寥几笔提到克新的禅风与诗风继承自笑隐大猷禅师。此外，宫凌静的《江苏明代诗僧研究》[4]与周骞骞的《明代浙江诗僧研究》[5]是区域诗僧研究的重要成果，从宗派法脉和地域文化等方面考察了诗僧的创作生态。李瑄的《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6]虽以明遗民为分析对象，但对理解遗民与遗民文学有重要作用，李瑄将“遗民”界定为：在易代之际以“不仕新朝”为基本行为表征，同时以“故国之思”与“遗民意识”为内在精神支撑的特殊士人群体，其核心特征为行为上的“去就”选择与其立场相统一，区别于因个人性情而隐居的“逸民”。萧启庆在《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7]中论证道对元明易代之际的士人而言，忠君的道德准则比华夷有别的民族观念更为重要，揭示了在朝代更替时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这些研究为本文理解克新的诗文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上述研究中，僧人与遗民通常被置于两条不同的学术脉络中探讨，克新则同时承载了两种身份，佛教教义要求他超脱世俗、出离执着，而出于元遗民立场的个人情感又使他难以真正忘怀故国、认同新朝。克新作为曾弃儒入释的僧人遗民，在易代之际展现出在方外超脱与政治关怀之间徘徊挣扎的复杂精神状态，克新的故国之思不等同于儒士的忠节，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记忆与情感习惯，对元朝的怀念更多是出自佛教慈悲精神对战乱中生灵涂炭的悲悯。本文通过考述克新在元明易代之际的诗文书写，理解克新的遗民心态与立场。基于克新所处时代与生平以及其诗歌文本本身，本文侧重以政治角度解读克新诗歌，辅以审美与佛教教义同时解读。克新历经元明鼎革，其题画咏物、酬赠送别之作中所用的典故映

射出元明易代这一历史情境，大致流露出怀念元朝、望其复兴的期待，而对新王朝明朝多有指摘。克新以“江左外史”自居，却无法完全置身于政权更迭的政治旋涡之外，揭示了他在“方内”与“方外”之间的两难处境。

2. 克新的生平与创作

“克新，字仲铭，号雪庐，自称江左外史，鄱阳人”[8]，俗姓余，生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9]，卒年不详，是北宋名宦余襄公余靖之九世孙，也是元末高僧笑隐大诃禅师最年幼的弟子。克新最初学习科举之学，元顺帝至元元年(1341年)到六年，元廷停罢科举，仕进之路不通，遂弃儒入释，“出游庐山，下大江，览金陵六朝遗迹”[10]。克新沿长江东下金陵，至正元年(1341年)稍前，二十一岁的克新入金陵大龙翔集庆寺，拜大诃门下。时大诃任大龙翔集庆寺住持，克新在大诃门下掌文疏，大诃卒后，在继任住持守忠昙芳下为参禅徒众一员，前后掌书记于集庆寺长达七年之久，在第三任住持怀信孚中任职之初，约至正九年(1349年)，离开此寺，东行前往苏杭一带[9]。《列朝诗集》载：“兵起，留滞苏杭，主常熟州之慧日，迁平江之资庆。”[10]，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韩林儿于颍上起事，天下大乱，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军攻取集庆，进驻大龙翔集庆寺，次年，朱元璋下诏改大龙翔集庆寺为大天界寺。因此，克新停留在张士诚治下的苏杭一带，卓锡于常熟州慧日寺、平江资庆寺与承天寺、嘉兴水兴寺。张士诚于至正十七年降元，被封为太尉，彼时张士诚正与朱元璋所据应天形成对峙之势，期间克新与张士诚部下官员苏大年、唐伯刚多有诗文酬应。在嘉兴水西寺期间，与杨维禎、顾瑛、丁复等当时东南名士往来密切，尤与顾瑛的交往最为深厚，顾瑛的《玉山倡和》中收录了多首与克新唱和之作。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建立，克新时约四十八岁。明洪武三年，克新被诏至南京，同年六月，朱元璋“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所过山川地形以归”[11]。此后行踪无考，卒年不详。

克新的著述，见于著录者约有四种。其一为《金玉编》，据《金玉编》序所载：“若今翰林承旨张公、江浙左丞周公、中书参政危公、故监察御史程公，皆笃斯文之好，而觉隐诚公、南堂欲公、用章俊公，尤善定年之谊。由是，四方英伟文雅之伦，莫不向风而愿内交焉。故其词章之往还，翰墨之酬酢，殆无虚月。粹而集之，凡若干首。仲铭德其言，题之曰《金玉编》。既而沦于兵火，存者十仅一二耳。今其犹子偶以其存者谋寿诸梓，请予序之。”[12]从释至仁为之撰写的序中可以得知，《金玉编》初次编成，约在克新于大龙翔寺任书记期间(约1341~1348年)，四方文士皆愿纳交，相互赠答诗篇，克新遂将唱酬诗作汇集成编。后原稿毁于兵火，仅存十之一二，克新之侄将残存的部分收集起来并刊刻出版，请释至仁为此作序。邓锐龄先生曾考察日本所藏和刻本影印本，知此书卷首有至正二十三年(1363)十月张翥序、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一月释至仁序，共收诗一百一十二首，其中克新诗十八首，其诗友达六十余人，依年次编列，始于至正八年(1348)十二月，讫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9]，该书元刻本已经亡佚。其二为《雪庐南询稿》，或称《雪庐集》，《明诗综》中载有“有雪庐南询稿”。

“克新，字仲铭，自号江左外史，鄱阳人。元末住嘉兴水西寺。洪武初，召至南京，奉诏往西域招谕吐蕃。有雪庐南询稿。”[13]

《列朝诗集》中亦有记载：“公为文二十年，所著有南询稿。黔南程文、河东张翥所正也。”[10]称克新著有《南询稿》，《南询稿》即《雪庐南询稿》之简称。《南询稿》由程文、张翥订正，推测编成于元末，以古文为主，包括《送侧失总管还朝序》《苏院判招降诗序》等序文。沈季友在《槁李诗系》中记：“初著南询稿，毁于兵，今惟雪庐集行世。”[8]邓锐龄先生考证，钱谦益所见之《南询稿》当是克新的别一著作，然钱氏《绛云楼书目》未收，此即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的克新《雪庐南询稿》。现原稿已亡佚[9]。

其三则为《雪庐稿》，明《文渊阁书目》著录“僧克新雪庐稿，一部，一册”[14]，钱谦益《绉云楼书目》卷三亦有所佐证：“克新雪庐稿，新公所著，又有南询稿，黔南程文、张潞公所正也”[15]，此书为克新的个人诗文别集，以诗歌为主，与以古文为主的《雪庐南询稿》有别。邓锐龄先生考证，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初夏，周伯琦为之作序，可以得知《雪庐稿》在元末已经编定成书，据克新撰《澹居稿序》，此书由吴兴人皇甫廷玉编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夏，杨维桢应刘海之请作《雪庐集序》。四库全书未收，现今国内是否存留亦不得而知。收诗一百二十八首，仅收七绝与七律，其他诗体不见，已非全本[9]。

其四为《元释集》一卷，清抄本，系后人辑，据《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明释克新撰。克新姓余氏，字仲铭，自号江左外史，又称为雪庐和尚，鄱阳人。元末住嘉兴水西寺。洪武初召至南京，尝奉诏往西域招谕吐番。所著有雪庐南询稿。此本别题元释集，仅古今体诗六十余首。考赖良大雅集载有克新诗四首，而此本皆无之。盖后人于雪庐集中摘录抄存，非其全稿也。”[16]

此段提要，既著其生平大略，亦说明此书由来与收诗状况。《雪庐南询稿》为其原集，今已罕见全帙，唯此抄本尚存一脉。邓锐龄先生曾予考证，现今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清抄本一册，收诗六十八首，除七绝七律外，还收录了五律、古体诗等《雪庐稿》和刻本所缺的诗体，然而亦非克新诗作之全貌。

3. “方外”之象与“方内”之心

克新现存的诗文，笔者共搜集到80首。综观其现存诗文的分布情况，题画咏物之作约33首，酬赠送别之作约24首，战乱感怀与遗民书写约17首，佛教修行与寺院生活约6首。明末清初文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对克新诗文的政治立场有所概括：“大率望庚申之中兴，美张氏之内附，而于圣朝多指斥之词。其为文自称江左外史，殆亦有微指与。”[10]邓锐龄先生对此也指出：克新在天下扰攘中，他一直以元为归属，因张士诚归附了元廷，所以在张士诚与朱元璋争霸之际，对张一方寄予同情[9]，笔者阅览克新现存诗文，直接的不满之词并不显著，可能存在于克新已佚的序文中，然如今已不得见。现存诗文所见克新的政治立场更多隐含于典故、意象与历史人物的书写之中，展现出一种“隐微书写”的表达方式。克新作为僧人，佛教空性观使其深知一切王朝兴替终归寂灭，佛教固然主张无住无念，而慈悲本怀恰恰又要求克新保持对世间苦难的关怀，使他不能真正忘怀现实的战争苦难。隐微书写的方式恰好地揭示了克新作为元明易代之际诗僧的这一矛盾心理，一方面在题画咏物之作中营造了方外超脱的形象，另一方面战乱感怀与遗民书写诗作中流露出方内之士的现实关怀与政治抱负。这一矛盾心理

题画咏物之作在笔者搜集到的克新现存诗歌中占比最大，约33首。这类诗歌以山水、竹石、花卉等自然景物为题材，描绘出隐居田园、山林幽居之趣，表面上是纯粹的方外之音，实则同样隐含着克新的政治态度。《题画(七首)》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其中其三云：“人生只合江南住，一曲溪山二顷田。红稻吹香苾菜美，春花秋月自年年。”[17]此诗直抒胸臆，表达了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是克新归隐之志最直白的表达。其四云：“空谷云深山路遥，一湾桃雨涨溪桥。白驹皓皓人如玉，几度春风长藿苗。”[17]“白驹皓皓”化用了《诗经·小雅·白驹》中的“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原诗意为隐士远遁、不可羁留。克新在此处借喻隐者之高洁，“人如玉”进一步以玉喻德，末句“几度春风长藿苗”化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首阳之事，藿苗即豆叶，为隐者所食，暗含了克新不意出仕新朝的遗民立场，与隐逸理想融为一体。置于佛教教义中，“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亦是一种对正法的坚守。其五云：“山中宰相鬓毛斑，两个青松屋一间。草满空庭春昼永，看云飞去看云还。”[17]“山中宰相”借用南梁隐士陶弘景之典，陶弘景隐居茅山期间仍参与朝政，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克新在此以“山中宰相”自喻，既有遁世之思，又有用世之意，“鬓毛斑”与“春昼永”对照，表现了以克新为代表、元明易代之际的文人，在新朝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迫隐退的处境中，因志业未成而感到时不我待。其六云：“万松深处一

茆亭，坐对匡庐九叠屏。黄鸟出林春未老，一溪花雨昼冥冥。”[17]在佛教无常观中，春光易逝是世间常态，克新对诸行无常的切身体认使他对乱世中美好事物的消逝有更强烈的悲悯，流露出感伤之情。其七云：“霜落江山木叶空，千岩修竹夜生风。莲华峰顶巢云客，独自吹笙明月中。”[17]此首为组诗的收束之作，“莲花峰”本为佛教圣境意象，“独自吹笙”不仅是避世者的清高，更是克新作为僧人面对世间苦难无力救渡的无奈。克新在这组诗中所使用的山水意象、化用的隐士典故，看似表达了归隐田园的志趣，实际也可能是迫于朱元璋的集权而不得不做的生存策略，是对时局的回避与无奈，隐约传达出自己隐逸高洁、追怀故国、不仕新朝的政治立场。

《隐居图》虽以题画为名，却更为直接地表达了克新不仕新朝的姿态，云：“战马多刍战士肥，总抛逢掖著征衣。首阳商岭无人到，几度春风老蕨薇。”[17]首两句中“逢掖”为儒者之服，“征衣”为军装，战乱之际，所有儒生也穿上了戎装，暗含着克新对战乱使文人失去安身立命之所的批判，后两句依旧借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首阳的典故，“无人到”包含了一种佛教末法意识，暗示到在克新所处的元明易代之际已经没有人愿意像伯夷、叔齐一样坚守遗民之节，体现了克新对他自己无法完全拒仕新朝以及对这个时代遗民理想彻底失落的叹息。《辋川渔乐图》云：“华子冈头辋口庄，桃花春水涨沧浪。先生投疏归来早，半世功名一钓航”[17]，此处借用了唐代诗人归隐辋川的典故，表面写王维，实则写克新自己，与王维的主动归隐不同，克新的归隐是迫于朝纲峻法，以及回避政治现实的生存策略，克新在这首诗中否定了现世功名的价值，抒发了归隐之志。

《题马》一诗，虽归入题画咏物，却借咏马以寄慨：“伯乐不复作，世间有马无人识。騄骝服盐车，垂首太行饥且驱。驽骀居天厩，身被文绣馐刍豆。吁嗟乎，驽骀饱，騄骝饥，虽有千里将奚为？”([18], p. 2)诗中借用《战国策》中骥服盐车的典故，以騄骝与驽骀相对照，批判了贤愚倒置、怀才不遇的官场风气，此诗既可解读为对元廷用人失当的批判，也可解读为对新王朝明廷未能用尽贤才的讽刺，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所征召的僧人，多被视为施行“以教辅政”政策的政治工具，并非真正的识马之人。“伯乐不复作”的悲叹本质上是一个僧人面对浊世，对正法不彰的痛心。克新的题画咏物诗并非纯粹的方外之音，与其诗中引用的隐士不同，克新的归隐带有一定被迫的原因，是一种在明初政治环境下的生存策略。克新借诗作抒发自己的隐逸理想，树立方外之士的形象，同样隐含着自己对战乱的感伤、对时局的关切、对壮志难酬的悲哀，饱含方内关怀。在克新笔下，山水田园既是逃避现实的桃源，也是自己修行悟道之所，隐逸典故既是遗民立场的曲折表达，也是佛教出离心的呈现。

克新亦作有很多直接反映元末明初战乱社会现实的诗歌，这些诗作以纪实的笔触描写了兵戈扰攘之下百姓的苦难，这部分诗作数量不多，约 17 首，是最能体现克新没能真正超脱方外的现实关怀。《壮丁行》云：“去年差壮丁，驾船下海讨狂贼。今年差壮丁，荷戈远戍河南北。去年行者秋已还，今年去者无消息。去年壮丁初发时，始苏驿前江水湄。长枪巨戟各在手，椎鼓鸣钲扬大旗。爷娘顿足妻招手，号哭向天泪如雨。阴风萧萧黄尘飞，日落哭声犹未已。近闻河北新战平，血流如海尸如城。呜呼，安得尽销天下之甲兵，铸作农器驱民耕。”([18], p. 3)其中“爷娘顿足妻招手”与前文所提《隐居图》中“总抛逢掖著征衣”相呼应，描写了壮丁抽发的场景，“安得尽销天下之甲兵”的悲叹，是克新作为方内之士最直接的诗意表达，也是慈悲本怀的流露，菩萨行要求修行者深入世间，救济众生之苦。《送石仲德司丞》云：“戎马生四郊，避难去乡国。乡国豺虎多，十年归不得。旅食大江南，田野亦荆棘。游鱼潜旧渊，飞鸟栖故林。天地物尚尔，我独何为心。驱车戒远道，岁寒冰雪深。兵革方去息，长淮渺烟草。况有简书紫，岂止还家好。政余事耕桑，虚名奚足道。”([18], p. 1)此诗以送别作引，抒发离乱之痛、乡国之思与归隐之志，将战乱之下游子漂泊无依的处境写得沉痛而真切。《初至樵李遇蒋渔石大使》云：“通越门中逢故人，爽溪桥上送余春。燕飞官巷桃花老，莺啭江亭杨柳新。行李风尘千里道，缁袍天地百年身。未闻淮海休兵甲，回首关山一损神。”[8]以与友人重逢为引，展现了个人流离之苦与天下未定之忧。与《高同知

怀传轩》中的“疮痍满天地，霖雨若为倾”([18], p. 4), 以及《赴慧日寺途中寄缪同知(二首)》其二中的“稷荒田野鸡豚少, 潮落汀沙鱼鸟稠。虚市残民茅结宇, 空原枯骨草连丘。”[10]共同记录了世道凋敝的现实, 体现了克新对百姓与时局的忧虑。在这些诗作中, 克新以不忍众生苦的菩萨心直面苦难, 既源于儒家的仁爱传统, 也植根于佛教的慈悲理念。

克新的遗民心态更多隐含于诗歌中的典故与意象之中, 很多诗作都表现出对故国的悲痛与追怀, 以及对朝代更迭引发战乱的哀痛。《西湖景(二首)》其一云: “苏子堤边杨柳春, 湖中箫鼓画船新。谁知歌舞繁华地, 回首东风没战尘。”([18], p. 17) “苏子堤”即苏堤, 始建于北宋元佑五年, 苏轼任杭州刺史时主持修建, 既象征太平盛世下文人的功业, 同时将宋元明三代的兴亡更迭表现出来, 反衬出当下的时局动荡。其二云: “山色湖光雨后天, 两边楼阁丽苍烟。酒船歌管随烽火, 落花开花杜宇啼。”([18], p. 17) “杜宇”即望帝, 相传蜀王杜宇退而隐居西山, 死后化为杜鹃, 昼夜鸣叫, 克新在此处用典以暗示亡国之悲。在《送除上人之武林》中云: “荆棘铜驼凄暮雨, 楼台铁凤堕秋烟。”([18], p. 9), 又用“荆棘铜驼”之典喻亡国之痛。《岳飞墓次刘治中韵》则以咏史方式发出感慨: “方拥貔貅驱塞虏, 岂期鹰隼被虞罗”([18], p. 7), 借岳飞被冤杀之事, 感叹与岳飞相似的忠臣为国效力却难逃被猜忌的命运, 明朝建立后, 朱元璋废丞相, 屠杀功臣, 空前集权, 很难说没有现实指向, 更揭示了易代战乱之际五浊恶世的本质。

从这几类诗作可以看出, 克新在元明易代之际创作的诗文, 隐逸理想、遗民心态与用世之意并存, 在归隐与入世之间摇摆。然其诗作中表现出的归隐之志, 与其说是纯粹的方外超脱, 毋宁视作被迫选择的生存策略。与此同时, 他沉湎于对故国的哀痛追怀之中, 不愿仕新朝, 借题画咏物诗作中描绘的山林幽居、田园归隐, 回避明初的政局变化。而随处可见的战乱以及由儒入佛的经历, 使其不能完全忘怀现实政治, 诗作中仍表现出强烈的用世之意与壮志未酬。

4. 元末明初克新的边缘处境

克新一生经历了弃儒入佛、由元入明的双重身份转换, 他自号“江左外史”, 这一名号本身就体现了他的矛盾心态与政治隐衷。“江左”狭义指金陵, 元时称集庆, “外史”指禅寺中书记这一职务的别称, 邓锐龄先生考证后认为克新以此自号, 意在追怀早年在大龙翔集庆寺的稳定生活[9]。克新因元廷罢科举而由儒入佛, 二十一岁入金陵大龙翔集庆寺, 拜高僧大诤门下, 掌书记七年, 文名鹊起。与同期的宗泐不同, 宗泐八岁便跟从大诤受业, 元明之际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 宋濂赞其“具大福德, 足以荷担佛法, 证大智慧……屹中流之底柱, 转大地之法轮。信为十方禅林之所领袖”[19], 在江南佛教界享有显赫地位与名声, 宗泐入明后, 太祖朱元璋对其礼遇有加, “呼季潭泐秀才”[20]。洪武四年, 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太平兴国寺建广荐法会, 宗泐列居首位, 奉命制《善世曲·迎佛》《昭信曲·献香币》等赞佛乐章八章, “太祖临筵叹美, 命住天界, 屡驾临幸, 召对内庭, 赐膳无虚日”[10]。

克新则始终以文人身份交往于禅林与文坛, 游离于政治边缘, 在佛教界影响力也较为低弱。克新自至正九年(1349年)离开大龙翔集庆寺, 长期生活在张士诚治下的苏杭一带, 对张士诚归附元廷流露褒美之意, 对元朝的认同较其他僧人更为深切。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 对张士诚旧部及江浙一带曾拥戴张氏江南绅民、官吏文人深怀忌惮, 《康熙两淮盐法志》中记载民间曾相传: “张士诚久与王师对抗, 明太祖怒其顽固, 恶其民而迁之, 摒弃于滨海, 服以世世劳役, 藉以侮辱之”, 传说中朱元璋以此报复江南吴地人此前支持张士诚与自己对抗的行为[21], 克新因僧人身份幸免于难, 却因长期生活在苏杭一带的经历及诗文中的政治倾向, 在明初政治中依然处于边缘地位, 在新朝难获信任。入明后,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 四十九岁的克新被诏至南京, 以知天命之年远赴西域, 招谕吐蕃并收集情报; 洪武十一年(1378年), 宗泐时年六十岁, 同样以高龄奉旨出使西域, 归国后仍授僧录司右善世, 后有《西游集》传世, 详录往返道中见闻[22]。而克新出使后, 行踪无考, 卒年不明, 无一首诗文记录下西域经历。这一命运, 正是明初

统治下文人身不由己的缩影。

克新入明后的边缘处境,既源于他和宗泐在佛教中地位悬殊,也由其与宗泐截然不同的诗文取向所致。宗泐在入明后创作了大量颂扬朱元璋与明廷的诗歌,如《钦和御制暑月民劳律诗》《钦和御制思亲怀古律诗(二首)》《钦和御赐诗》等,诗歌中颂扬了朱元璋起兵以来的功绩,表明了建明称帝是民心所向,并表达了自己对朱元璋及明廷的感恩之情^[22]。在明初政治环境下,这些诗歌无不体现了宗泐作为佛教僧人,出于强烈的用世之意,而对皇权表现出屈服、迎合与颂扬。而克新在入明后的创作,仍然表现出对明廷的疏离、对故元的追怀。《次韵顾仲瑛移家樵李作》云:“画舸载书随蚤春,平湖雪消杨柳新。黄鹄九霄不可致,白鸥万里谁能驯。谢安自是庙堂器,元亮本非丘壑人。圣主征贤图治亟,未容便作耕桑民。”^[8]克新在诗中劝说好友顾瑛出仕明朝,也是克新本人对明廷征召的态度,“未容”二字暗示了明廷的强制性态度,体现了克新的妥协与权宜。与上文诗歌中的战乱描写结合而看,克新作为一名由儒入世的僧人,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比一般僧人更为深切的理解与关怀。克新试图以方外之身自处于政治旋涡之外,却无法做到完全超脱于世俗之外,抛却政治与现实,也不能拒绝明廷的征召。二人在诗文创作上的差异,既是各自在明初身份地位的反映,又反过来对各自的命运有深刻影响。

参考文献

- [1] 代刚.《明僧弘秀集》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贵阳: 贵州民族大学, 2023.
- [2] 李玉栓, 张可. 明代僧诗的佛教文化考察[J]. 中国文化论衡, 2021(1): 111-124.
- [3] 李舜臣, 欧阳江琳. 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 63(5): 574-581.
- [4] 宫凌静. 江苏明代诗僧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
- [5] 周骞骞. 明代浙江诗僧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20.
- [6] 李瑄. 明遗民群体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8: 9-18.
- [7] 萧启庆. 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M]. 上海: 中华书局, 2026: 266-338.
- [8] (清)沈季友, 编.《樵李诗系》卷三十[M]. 四库全书本: 31-35.
- [9] 邓锐龄. 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迹考[J]. 中国藏学, 1992(1): 126-133.
- [10] (清)钱谦益, 撰.《列朝诗集》闰集第一[M]. 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46.
- [11] (明)《明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十三[M]. 洪武三年六月癸亥.
- [12] 王媛. 元人总集叙录[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8: 273.
- [13] (清)朱彝尊, 撰.《明诗综》卷九十释子一《克新》[M]. 刻本: 21.
- [14] (明)杨士奇, 编.《文渊阁书目》卷二[M]. 四库全书本: 45.
- [15] (清)钱谦益, 撰.《绉云楼书目》卷三[M]. 清道光 30 年刻本: 27.
- [16] (清)纪昀, 撰.《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二十八《别集类存目二》[M]. 武英殿本: 5.
- [17] (明)毛晋, 辑.《明僧弘秀集》卷八[M]. 毛氏汲古阁明崇祯 16 年刻本: 21-23.
- [18] (明)释克新, 撰.《元释集》一卷[M]. 清抄本: 1-17.
- [19] (明)宋濂, 撰.《宋文宪公护法录》卷九[M]. 径山化城寺明天启元年 3 年刻本: 24.
- [20] (清)陶元藻, 辑.《全浙诗话》卷三十八[M]. 嘉庆元年怡云阁刻本: 1.
- [21] 曹生文, 俞扬, 茆贵鸣. “洪武赶散”传说与明初苏北的江南移民[J]. 江苏地方志, 2022(1): 14-17.
- [22] 赵伟. 明初政治文化与宗泐的创作[J]. 五台山研究, 2021(2): 15-22.